

从台湾公费生到图书馆学家

——杨威理先生图书馆生涯及学术贡献考略

梁转琴

摘要 杨威理先生精通多种外语,早年 to 日本留学攻读医学,1946年回台后以台湾公费生入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其少年就遵循父亲教诲,立志成为中国大政治家、外交官的他,却当了40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馆长,建立了一所藏书近百万册、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史文献的图书馆。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尤其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目录学和西方图书馆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推动了图书馆各项事业持续发展,成为著述数百万字的学人,重要的图书馆学家。

关键词 杨威理 台湾公费生 图书馆情缘 图书馆学家 马列主义目录学 西方图书馆史

On Yang Weili's Library Career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Academy: From a Taiwanese Student on Public Scholarship to a Library Scientist

Liang Zhuanqin

Abstract Yang Weili has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t his fingertips. He studied medicine in Japan in his early years, and later in 1946 he entered Beijing University as a Taiwanese student on public scholarship. During this period he renounced the pen for the sword, influenced by progressive ideas. Followed his father's instructions he aspired to be a great statesman and diplomat in childhood. Nevertheless, he established Asia's largest library with a collection of nearly one million in socialist history documents and became the dean of the libr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H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bibliography of Marxism-Leninism classical works an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brary.

Key words Yang Weili, Taiwanese student on public scholarship, A library scientist, The bibliography of Marxism-Leninism classical works,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brary

杨威理先生原名陈威博,生于1925年8月,台湾淡水人。1943年到日本留学。1946年回台,后以台湾公费生入北京大学学习。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馆长,是第一、二、三届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第一届中央国家机关和科研系统图书馆学会理事长。研究馆员,图书馆学家。现定居于日本。^[1]

1 台湾公费生概况

1946年7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举办一场考试,录取了100位台湾青年,公费

派遣到北大、厦大、复旦等校升学,这100人被称作“公费生”。他们上榜后,分发到哪所大学完全按照个人意愿,想去北大就去北大,想去厦大就去厦大,完全没有任何名额限制或条件筛选,无须与其他省份的考生再来角逐一次。这完全是“中央政府”和台湾政府为台湾学生开的一扇方便之门。公费生政策是1946年台湾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政策,更是1946年台湾学生升学的唯一渠道。^[2]

1946年国民政府派遣至大陆的公费生,是台湾历史上首次由政府有计划培养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两岸关系史上,第一次有组织

的官方交流活动。所谓有计划培养，是指这批公费生在学成后要返台进入政府服务一定年限。若表现卓越，就可以继续在政府部门工作下去，将来成为台湾政府里本土出身的骨干。这是公费生的任务之一。所谓有组织的交流活动，是指公费生们还肩负有学习祖国文化的责任。公费生的任务之二，就是要去学习和了解祖国文化，促成两岸知识分子互相了解与交流，然后再传播到社会其他阶层去。^[3]所以说这批公费生不论在台湾历史或是两岸关系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形式的两岸交流，不但在清朝以前没有，在两岸改革开放后亦没有，可说是两岸关系中空前绝后的一段记载。^{[4]184-185}

解放战争结束后，约有三分之一的公费生滞留在大陆。^[2]其原因各异。留下来的公费生中，其中不乏优秀者，在某些专门领域对建设新中国的贡献很大。不过，在几次大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会因为身份特殊而受到冲击，或劳改，或流放，或家破人亡，一个人就有一本说不完的故事，没有一个人能够走上1946年预定的道路。

两岸改革开放后，公费生终于可以回到台湾故土，他们的台湾亲人也可以到大陆探望。但台湾当局已经完全抹杀公费生的历史，抹去了他们台湾人的身份与户籍。于是他们的返乡之路异常艰辛，最终只有少数人顺利返台定居，大多数只能以返乡祭祖的名义短暂回台湾停留几天。

六十多年过去，依然健在的公费生都是八十余岁的老人，主要生活在北京、上海、福州、南宁、哈尔滨等城市，他们见证了新中国成立数十年的变迁。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感触，更加深刻。本文所说的杨威理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2]

2 父亲望子成龙——期望他成为一名政治家

杨威理祖籍厦门同安。小时候，他父亲就期许这位长子能积累深厚的学问与本领，等到未来中国崛起，杨威理可以回到大陆，成为报效祖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外交官。^[1]

2.1 从小接受日本教育

台湾同胞在殖民统治时期受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杨威理的父亲决定让他从小接受日本教育。因此，从幼教开始，杨威理就被送到日本人设立的名牌幼儿园——台北幼儿园。杨威理父亲是个下级铁道职员，而且台湾人的薪水又比同职别的日本人要低；日本学校里的台湾学生也饱受歧视，同样的表现，台湾学生的分数总是不如日本学生。但杨威理父亲还是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路。

2.2 父亲不惜以养子的策略取得日本人的身份

父亲考虑到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说不定最后大学上不了，家里就先破产了。在杨威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父亲通过日本好友太斋君的介绍，成了日本石卷市中目家的养子。太斋氏和中目氏都是仙台藩士（藩士乃日本江户时代封建藩主的家臣）。中目氏膝下无后，本想领养子嗣，于是就收杨威理父亲为继承人。杨威理父亲就这样取得日本人的身份。不过，他父亲只有把自己的户籍迁到石卷，才是日本人口；他考虑到杨威理将来要赴大陆从事政治活动，所以把杨威理和母亲的户籍留在淡水。后因父亲工作之故，杨威理和父亲一起前往“满洲”进入大连的小学以及大连三中，在那里度过了7个春秋。

2.3 双重身份，骨子里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当时的大连三中实施的是彻底的天皇教育，还是台湾籍的杨威理表面服从，其实内心充满反感。他的父亲经常告诫他：“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忍痛蛰伏一个时期。”杨威理说，有一件事情使他终生难忘，那就是父亲曾在他的手掌写一个大大的“汉”字！少年杨威理开始过着双重身份的人生。在学校，师长和同学都把他视为具有十足日本意识的日本臣民；在课外，他偷偷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压抑不住对祖国的思慕。

他父亲在杨威理中学毕业前对他说：“你要考入帝国大学的医学院。另外，还要进入私立大学法学院夜间部。白天学医，晚上学法，这一定很辛苦，但你一定要取得两个学位，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当政治家。手中握有医

术,你就能够无所畏惧地坚持你的政治主张。万一下台,还可以开业,不怕没有饭吃。伺候良机,东山再起。”足见其父的良苦用心。^[1]

1943年杨威理考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1945年入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院。在仙台,杨威理掩饰了台湾人的身份,谎称自己就是日本人,同学深信不疑,连班主任也称他是来自“满洲”的现代化日本青年。但是随着年纪、学问与见识增长,杨威理的中国人意识愈来愈强烈。

2.4 公费生招募圆了他的北大梦

杨威理双重身份的日子在抗日战争日本人战败后结束了。留日的台湾学生都说:“把大和魂扔进太平洋,赶快回去建立新中国!”杨威理憧憬北京大学,决定放弃东北帝大医学院的学籍回祖国求学。但战后局势混乱,杨威理无法直接奔赴北京,遂在1946年2月返回台湾,被教育处分发至台大医学院。同年7月巧遇上公费生招募考试,他旋即考上公费生,以法科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北大经济系。^{[1][4]199}为什么不当医生改学经济?因为他坚信马克思所言:“不学经济学,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

2.5 “沈崇事件”和“二二八事件”后的杨威理

刚到北大,1946年12月24日发生“沈崇事件”,杨威理和许多公费生都参与了反美示威游行。在台湾参加抗日活动被逮捕坐牢好几年的詹以昌逃到北京,给予了北大公费生许多革命道路上的指导。他总是大胆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演说,让公费生深夜在他家偷听延安广播,启发公费生的思想。1947年2月28日,台湾岛内发生“二二八事件”,由于国民党封锁了消息,一开始台湾公费生不清楚真相,后来通过家人的信件才了解实情。公费生到美国领事馆的图书馆翻阅香港报刊和外国新闻,整理许多信息。杨威理是北大公费生的领导,在他的组织动员下,加上几位大陆学生提供的帮助,他们一晚上写了十几张海报,第二天一早贴在北大民主广场的墙壁上,使原本只是发生在岛内的事件,一天就传遍整个北京城。北京报馆的记者也采访了公费生,翌日刊载此新闻,上海的某家报刊还以头版头条报道了北大公费生揭露“二二八”真相的海报墙。北大公费生还

编印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访问北大几位名教授谈论“二二八事件”的记载,一本是当时有关“二二八”的报刊言论集,这应该是台湾人最早有意识编纂的“二二八”史料。公费生在“二二八事件”中所做的宣传和努力,引起了北大进步学生的注意。他们开始接触公费生,让他们参加读书会等活动,传播进步思想。^[1]

2.6 从北大到解放区到参加建国典礼

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平津战役开打前,杨威理就投笔从戎,1948年假扮商人离开北平潜入解放区参加革命。三个月后他同人民解放军再次进城。1949年10月1日,杨威理和北京市民一起参加建国典礼,^{[5]509}流着热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年,杨威理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杨威理的图书馆情缘

也许是因为他从小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杨威理先生毕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成为现代重要的图书馆学家。^[6]

3.1 中小学时期与图书馆

杨威理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时第一次接触到图书馆,那是台北市一所儿童图书馆。那里美丽的画册、有趣的故事、热忱服务的阿姨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在他幼小的心间烙下深深的印记。

杨威理随父亲来到大连上高小的时候,学校开架式的图书馆使他铭记于心,那里收藏的一大批天文学通俗读物成为他天文知识的启蒙者。

杨威理在大连读中学时经常光顾“满铁”图书馆的一个分馆,他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苏联工农红军英俊威武的照片,揭露希特勒镇压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书籍,也是在那里最初认识了纳粹分子残忍而凶恶的行径。

3.2 大学时期与图书馆

杨威理先生1943年在日本仙台市第二高等学校求学的经历,直接影响他以后的治学道路和方法。他在学校的图书馆读到了郭沫若的日译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使他深受启发。较大的仙台市立图书馆,杨威理先生也经常去,令他历历在目的是馆员们和蔼、礼貌、周

到的服务。

杨威理先生 1945 年考入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帝大图书馆拥有上百万册藏书。英文原版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杨先生有幸在这里看到，其中中国共产党好几位领导人的照片也第一次看到，令他兴奋不已。

杨威理先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习时^{[7]406}，是图书馆的忠实读者，曾去“偷听”图书馆学课程。^{[5]509}学生们强烈抗议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不采购进步书刊。红楼西第一层是学生自治会自办的“子民图书馆”，藏有大量进步书刊（子民是蔡元培的字）。还有许多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刊藏在校园的许多壁报社的读书室里，在读书室里杨威理先生读到毛泽东的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躲避国民党搜查，杨先生和同学们在 1948 年夏曾在北大北楼地下室暖气房的大锅炉里藏匿不少珍贵的进步书刊。杨威理先生曾说：“子民图书馆和这些读书室对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书籍，我们的进步决不会那样快。”^[6]

3.3 工作时期与图书馆

1949 年 6 月，中央俄文编译局正式成立。最初杨威理负责整理日本人留下来的书籍。9 月，中央俄文编译局图书馆建立，24 岁的杨威理被任命为馆长，^{[5]509}这个馆长一直干到 1989 年离休，整整 40 年的光阴。为此他遗憾地说：“我遵照父亲的意愿回到祖国，但没有能够成为政治家。命运偏偏逼迫我湮没在书堆里。”^[6]

1953 年 1 月，杨威理先生组织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翻译出版任务，对所需图书资料如中外文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关论著、翻译必备的参考书刊等进行大力搜集，还制作了大量的资料卡片。

杨威理先生为了完成中央编译局 1954 年 3 月在北京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会的任务，带领图书馆的同仁们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制了一套图书目录，摄制了数百张珍本书的照片，以便观众在展览中了解马列著作的不同版本尤其是珍贵版本的收藏

地和相关信息，像最早的德文原版马恩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等，是一笔不可估量的珍贵财富。这些努力足见杨威理的图书馆学理念——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视。

杨威理先生在这座图书馆服务了 40 个春秋，建立了一所藏书近百万册、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史文献的图书馆。^[1]在长期领导图书馆工作的实践中，他带领图书馆同仁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推动图书馆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3.4 离休之后与图书馆

杨威理先生离休后，虽然身不在图书馆岗位上，可时刻心系于斯。他于 1989 年先后到英、法、日等国进行学术交流，考察图书馆事业。^[6]

杨威理先生到英国，考察了大英博物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伦敦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不列颠图书馆，剑桥、牛津图书馆以及亚非研究院图书馆。杨先生因撰《西方图书馆史》，被大英博物馆赐以“学者专家特别阅览证”，破例特许有效期五年的奖赏。他特别珍惜，常借此寻找据说是马克思和列宁经常坐的座位，在那著名的圆顶阅览室里，体验哲人追求真理之痛苦……^[1]杨先生也考察了伦敦辖区的数所公共图书馆。

1989 年晚秋，杨威理来到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吸引着杨先生，在那里杨先生也得到了特别的礼遇，他鉴赏了 16 世纪的法国爱书家格格里厄的藏书签票，并获准将这一珍贵文物拍照。杨先生还目睹了路易十四当年获康熙皇帝赠予的 45 套中文书。该馆东方部主任波易科女士与杨先生就这 45 套中文书的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杨先生还饱览了非常珍贵的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孤本文献。

杨先生到日本已是年末时，他来到曾经求学的地方讲学。曾任骏河台大学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讲师，新潟产业大学中国社会史教授，东京都立大学台湾社会史、中国社会史、日本社会史客座教授。现在是新潟产业大学的名誉教授。杨威理先生时刻也离不开图书馆，他对东京的“东洋文库”为读者免费开放体验颇深。

3.5 不能忘却的记忆——文革中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个月后，杨威理也

成了被斗的对象,失去一切权力和声望。他莫须有的罪名是右派、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海外关系、台独分子、祖国分裂主义者。^[6]

1968年杨威理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抄家。在单位被劳改、隔离、软禁,工资被扣。1971年秋,杨威理被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直到1973年夏天,他才结束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回到北京,并且从诸多政治罪名中被解放出来。^[1]

4 杨威理的学术贡献

杨威理长期致力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目录学和西方图书馆史的研究。主编《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生平论著目录》、《马克思恩格斯书目》、《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校订《安巴祖勉图书分类表》,撰著《西方图书馆史》、《私の昭和史》、《ある台湾知识人の悲剧》、《蔡元培传》等书。他的所有论文、作品和翻译、校订、主编著作结集成册,至少有20本专书、数百万字的篇幅,这还不包括他在动乱年代自行烧毁或是被抄走散佚的数十本日记、笔记、信件等。杨威理现在已经完成了他的自传,分别以中、英、日三种语言写成,尚待出版。据他自言,还有三四部书稿将要出版,我们期待这些书籍的问世。

杨威理这位从少年就遵循父亲教诲,立志成为中国大政治家、外交官的台湾知识分子,由于命运的捉弄,却成了著述数百万字的学人,重要的图书馆学家。

4.1 研究马列主义目录学

《马恩著作集的出版》、《列宁著作集的出版》两篇论文,发表在1958年的《历史研究》上,成为国内研究马列主义目录学的经典文章,一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参资料。《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汉译联合目录(草目)》是杨威理先生1959年组织本馆与北京图书馆联合编辑的。

1961年,他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的“参考书目”,有马恩的21篇论著、19封书信,包括《法兰西内战》、《论权威》等名著。共开列了115篇(封)马恩的著作、书信。

国内第一篇介绍马列主义外文书目的文章是杨威理的《马列主义外文书目的初探》,发表在1979年《图书馆学通讯》上。该文对在国外出版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书目,马恩列斯著作目录进行了介绍,书目150多种作为附录列于文末。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曾被有关刊物转载两次。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生平论著目录》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生平的综合性论著目录,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杨威理总编带领图书馆同仁于1983年编辑出版的。全书共收录各种不同观点的论著共1970条。其中论文1438篇、著作532本,时间在20世纪初到1965年4月,用中文在国内发表的。这是我国目录学界建国后第一本被译成外文(德译本)的书籍,促进了马列主义著作目录学工作的深入开展,对我国图书馆界影响很大。

4.2 结合编译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运史具体工作实践,进行学术研究

被苏联的《历史问题》杂志列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代表作品之一,引起当时苏联史学界注意的是杨威理的《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一文,发表在1958年《历史研究》上。他同年还写了《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创立——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发表在《新建设》第5期上。《五四运动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介绍》发表在1959年5月《人民日报》上。《鲍威尔言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等著作也是他主持编写的。

4.3 从理论与实践上不断探索,推动图书馆各项事业稳步发展

1953年的《列宁对苏联图书馆工作的指示》、1954年的《把书送给青年工人:列宁格勒的图书馆群众工作的经验》是杨威理先生与图书馆同仁们合译出版的;他的文章《图书馆史话》、《瑞士图书馆巡礼》1980年分别发表在《百科知识》、《图书馆学通讯》等杂志上;系列论文《外国图书馆事业史》连载在《图书馆学研究》上,后形成专著《西方图书馆史》于1988年出版,属开山之作。^{[8]2}与此同时,杨威

理先生还经常从事讲学活动，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目录学和外国图书馆史，包括在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杨威理先生搜集资料和学术交流的范围遍及苏联、荷兰、罗马尼亚、瑞士、日本、西德等国家，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介绍》等文章。^[6]他在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4.4 西方图书馆发展历史的研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威理先生发奋研究西方图书馆史，“将近两千个日日夜夜过去了。无论是酷热的夏季，还是严寒的冬天，我都紧握着笔杆。甚至在出差的途中，到国外访问也好，到国内讲学也好，飞机的起落，火车的轰鸣，都不能使我的双眼离开史料，使我的笔触离开稿纸”。^{[5]511}

《西方图书馆史》1988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约40万字，有序、前言、参考书目、索引、后记和作者简历，共12章、60节，137目、53幅插图。该书记述了五千多年来的西方图书馆发展史，起自两河流域的泥板文书，一直到现代化的图书馆设立。通过作者提供的丰富史料，使得我们了解到世界书籍制度的历史变迁，造纸和印刷术的推广应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图书馆的产生、特点和发展，服务对象的扩展和服务方式的改变，图书馆网络的建立与文献资源的共享，图书馆学教

育的兴起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开展，文献工作的标准化等图书馆事业史的重要方面。

作者的努力还在于分析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宗教等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联系和对它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图书馆事业对整个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由于图书馆本身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占的特殊地位，读者可以把《西方图书馆史》当作研究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材料来利用。^{[8]3}

《西方图书馆史》虽然论述西方图书馆的历史，但对于当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图书馆学研究，仍有借鉴作用。同时，它也不失为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8]3}

该书是第一部中国人撰写的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图书馆史的专门著作，开辟了我国系统地研究西方图书馆史之先河。被学界誉为“一部开人眼界的书”，^[6]“系统论述西方图书馆发展历史的专门著作，为中国研究外国图书馆史的工作增添了光彩”。^{[8]219}1990年，该书被评为全国优秀著作。

杨威理先生的一生几乎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图书馆。他深刻地体会到“图书馆是个绿洲，向读者提供可喝的清水”。“办好图书馆需要掌握一条：要作为一个读者来办馆，千万不能单纯地以一个馆员的身份来办馆。”^[6]这对所有从事和关注图书馆事业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启迪，一个警示，一份财富。

参考文献

- [1] 布拉瑞. 1946——滞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公派生(21) [EB/OL]. [2011-11-1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a92db20100yznc.html.
- [2] 黄新宪. 1946年-1949年台湾学生求学祖国大陆考[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6):136-142.
- [3] 布拉瑞. 1946——滞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公派生(1)[EB/OL]. [2011-09-10].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3222493&PostID=35400636.
- [4] 蓝博洲. 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M]. 台北:台北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1994.
- [5]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后记)[M]. 北京:商务

印书馆, 1988.

- [6] 金恩晖, 陈瑞玲. 坐拥书城四十载 事业学问皆楷模——集读者、馆长和学者于一身的杨威理先生[J]. 图书馆学研究, 1993(6):5-11, 23.
- [7] 萧超然. 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8] 周文骏. 西方图书馆(史序)[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2-3

梁转琴 女, 1962-, 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陕西渭南 714000

(收稿日期: 2013-06-07 编发: 刘 娟)